



牡丹帖

王祥夫

当年画牡丹，翻来覆去总会把白乐天的那首“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的牡丹诗抄上，因为画牡丹，也不知用去多少蛤粉。那年秋天还曾去过一次菏泽，雾很重，也湿冷，几个朋友于酒后去看牡丹，每人喝了半斤多烧酒，才不至于被冻得哆哆嗦嗦。也只是那一次，才知道牡丹最好是要在秋天的时候去种它，到第二年也许就会灿然地开出花来。

还记得那一次朋友一边喝酒一边问牡丹之所以叫“牡丹”是什么意思？这谁也不好说，这便牵扯到汉语造字造句的事。牡丹最早的名字是叫“鼠姑”或有人说叫“鼯妇”，就字面解，也一样是只能让人莫名其妙。古人对草木，亦像是对人，有平等心在里边，常见中药

谢，其他花瓣会跟着纷纷落下，春天也就彻底过去了。有时候天天盼着冬天赶紧过去，起码是在我，就是想看牡丹在春风里慢慢开起。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句话，我以为，原是用来说牡丹的，其他的花都当不起。有人这样说我，我亦高兴，觉得我自己真是牡丹，《楚辞》里的“芳草美人”原来只是好的意思，在那个诗的古时，男人也可以是芳草，男人也可以是美人。



华东行吟（四首）

栗培林

乌衣巷

秦淮河水泛青波，
朱雀巷里轶事多。
乌衣兵吼三千载，
东吴无奈成蹊陀。

无锡鼋头渚赏樱花

初春踏青鼋头渚，
三月樱花芬芳吐。
千枝万朵显疏影，
一双两只彩蝶舞。

题无锡惠山古镇

惠山祠堂藏幽梦，
长街短巷古韵存。
绿柳依依添秀色，
寻觅风情醉游人。

访常熟诸园

居士高踪何处寻？
常熟城内尽园林。
亭台楼阁皆精妙，
往事历历情自吟。

乡间春色

闫关山

放眼天边日影斜，
坡羊漫步起云霞。
巍峨岭峰岚氤势，
拂面春风待百花。

乌夜啼
桑干春天

郭永忠

平眼陌田泥湿，抬头丽日春光。
九曲桑干辰龙驻，塞上沐朝阳。
岸畔排排树翠，枝梢点点新黄。
一队白鹅清波舞，翼展秀娥妆。



春意盈窗

盛利者撰

春雨的脚步很轻
她来时
我在梦里追着一只风筝
一群燕子正变化队形

北方的粗犷
在春雨中细腻
杨柳婀娜，迎春含笑，桃花努嘴
盛大花事在即

春雨贵如油
无声胜有声
万物将蓬勃向荣
春天微醺，渐入佳境

春雨

李文芳

民族迁徙是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西方历史上有所谓“中世纪民族大迁徙”，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在中国古代，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五胡十六国，都发生了民族大迁徙的现象，尤其是古今的少数民族几乎都发生过迁徙。其中，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的迁徙最具有代表性，不仅因为它历史长，而且因为它影响大，且有一部分完整的民族志资料《魏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魏书》就是拓跋鲜卑的迁徙史。一个民族为什么会发生迁徙？中外学者提出了各种解释，主要有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气候的以及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国内学者在研究拓跋鲜卑数次“南迁”的原因时，也都集中在上述四个原因中，其中在文化原因上，也仅仅涉及到民族认同意识，至于其他的民族心理原因鲜有提及。因此，笔者想从民族心理学（人类学）角度进行尝试性的分析，提出一些看法。

关于“南迁”，《魏书》直接记载的是《序纪》中的两次“南迁”，后来，又迁都平城、洛阳以至于郢城，这些算不算迁徙呢？笔者认为应该属于民族迁徙，后面将具体分析。这样拓跋鲜卑历史上就进行了5次大迁徙，其迁徙的梗概如下：

第一次，“宣皇帝诹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魏书·序纪》）

第二次，发生在圣武帝诹汾时期，“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地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魏书·序纪》）

第三次，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六月，连下两道诏书，宣布迁都理由。“秋七月，迁都平城，始置宫室，建宗

拓跋鲜卑“南迁”的集体无意识动因探析

张小泉

庙，立社稷。”（《魏书·太祖纪》）

第四次，太和十七年（493），秋七月“幸洛阳，周旋故宫基址。”“仍定迁都之计。”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魏书·高祖纪》）

第五次，孝静帝永熙三年（534）诏曰：“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规。”“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宅漳滏。”（《魏书·孝静纪》）

拓跋部的两次“南迁”以及后来的三次迁都，表面看起来没有直接联系，单从词语角度看，“迁徙”与“迁都”也是有区别的。但是若从一个民族兴衰的整体上分析，却可以说是有内在联系的，学者们完全不必拘泥于概念的差别。过去各家观点，都重视分析前两次“南迁”，或者集中谈孝文帝的迁都，而没有将拓跋鲜卑两次南迁或三次迁都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民族文化现象，窃以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从民族心理学角度看，拓跋鲜卑的“南迁”以及后来的迁都是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性事情，每一次迁徙都有内在的民族心理动因，都是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其次，从民族志的角度看，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中国史学从司马迁《史记》始，就有了简短的民族志。而《魏书》可以说是拓跋鲜卑的民族志，虽然《魏书》从汉文化正史的角度给高句丽、蠕蠕等少数民族作民族志，但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大历史环境看，《魏书》其实就是一部拓跋鲜卑的大民族志，因此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开始的民族迁徙历史不能割裂。第三，在上文列举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史料中，其诏书中明确用了“南迁”一词，而且还总结了

第二次南迁和拓跋珪迁都平城的史实，阐明了迁都洛阳的理由和目的。此前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国家先帝旧墟”（即嘎仙洞）祭祀的祝文里，也有“历载亿年，聿来南迁”的句子。可见拓跋鲜卑自己认同这些迁徙性质是同一的，此为最直接的重要证据。

民族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从其产生的历史看，它与西方的文化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心理是特定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张积家：《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民族意识，它是民族共同体构成的最重要的心理条件，而其中的集体意识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关键。关于集体意识，冯特认为，集体意识是源于集体生活的心理产物，如语言、神话和风俗等。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理论，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提出了群体心理学理论，而瑞士的分析心理学派代表荣格则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论。上述各家理论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主要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为分析参照。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拓跋鲜卑自认是黄帝小儿子昌意的后代，“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魏书·序纪》）作为黄帝的后裔，当然就与中原汉族是一家人了。古代少数民族自称是华夏祖先后裔的不在少数。五胡之一的匈奴，《史记》记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但

是其民族心理却截然不同。西汉时，匈奴狐鹿姑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汉书·匈奴传》）其自尊自傲心理溢于言表。反之，拓跋部始祖力微皇帝，在二次南迁到定襄之盛乐时，一次祭天，白部部落首领没有来，力微就将其斩杀，并告诸部落首领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力微的这番话，如同民族关系的宣言，确定了拓跋鲜卑处理与汉民族关系的基调，这在古代少数民族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要知道此前西晋大臣江统曾写过有名的《徙戎论》，他引用《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而进一步上升到民族心理类的差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此时的力微为什么能摒弃民族偏见，说出如此具有历史远见的话？史书没有进一步交代，从现有的史料看，或许只能从史书中的神话传说和民族崇拜里去找答案了。因为拓跋鲜卑崇拜认同汉民族远祖，所以这种认同心理就自然成为拓跋鲜卑不断“南迁”的动因之一。

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的是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了“民族中心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人类，不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愿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在全世界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普遍特征。（段义孚：《恋地情结》）根据上述理论和相关资料，拓跋鲜卑因为被“外分

忆姚宾老主任二三事

高旭东

得知姚宾老主任于龙年二月二离世的讯息，我顿时热泪盈眶。这些天来，与姚主任相处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他任市政协副主席、市体改委主任期间，我在市体改委写了几年材料。1990年，正值企业两轮承包衔接之际，体改委的工作特别繁忙。一天夜里我突然发烧，早上向企业科孔志权科长请了假，不料当天上午办公室宋主任来家看望，说是姚主任派他来的，听了这话一股暖流温暖了我。

1991年5月，市委为总结肉制品厂改革经验，组成了市委调查组，市委樊荣枝书记任组长，姚主任和市政协李森林副主席、市委宣传部的曹杰副部长等任副组长，姚主任带我参加了此次调研。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和写作班子的奋战，拿出了上万字的调查报告。没几天，写作班子由市委政研室李德祥副主任带队重返肉制品厂，吃住在厂，赶写与调查报告配套的市委《决定》。第一天半夜时分，大同日报社的王学伟、市经委的白云、市委政研室的赵忠格和我边讨论、边写作，我们几个正值青壮年，竟饥肠辘辘。翌日上午，我向姚主任说了此事，他当即协调，厂里食堂连日给我们送上了夜餐。1991年7月21日，还是四开小报的《大同日报》配编者按，头版通栏转二、三、四版刊发中共大同市委调查组《在改革中起步 在改革中发展——大同市肉制品厂搞活企业的调查》；7月22日，《大同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中共大同市委关于向市肉制品厂学习的决定》。该厂的改革经验和市委《决定》见报后反响热烈，效果蛮好。

姚主任曾任市委工交政治部副部长、市经委副主任，理论涵养深厚，抓改革有胆有识。1987年6月15日、1988年1月20日，《大同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本报记者对他的专访《八年改革取得可喜成绩 我市经济体制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把改革放在首位 用改革统揽全局》。1988年4月13日我国第一部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颁布，自8月1日起施行。1988年7月20日、29日，《大同日报》二版头条刊发他的《要认真学习 和贯彻落实企业法》《把学习贯彻企

业法和完善承包经营结合起来》两文。1990年9月18日、21日，《大同日报》二版头条分两期刊发他的《试论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制》，该文论述了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支点，分析了企业承包制的实质及其功能、企业承包制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不断深化以企业承包制为中心的微观机制改革，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企业承包制、两轮承包包如何衔接的重要问题，读者甚多。1992年初，大同能源基地爆出令人惊讶的新闻：经中煤总公司批准、大同市政府同意，大同矿务局一举兼并了陷入亏损困境的大同市机床厂，这一跨行业兼并在大同市、大同矿务局乃至全国煤炭系统均属首家。我亲身经历，为推动这一兼并，姚主任多次主持协调会促成了这一改革新事物。随后，他撰文《论企业兼并》刊发《大同日报》二版头条。

2002年初，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响亮地提出“一切为了发展，重振大同雄风”，振奋人心。全市开展了“一切为了发展，重振大同雄风”大讨论。《大同日报》头版开设大讨论专栏，编辑部让姚宾老主任写一篇开栏之文。我时任大同日报工交部主任兼编委，给他打了电话，他慨然应允，并让我执笔拿个稿子，我完稿后去他家，他看后提出文中要加上“各级领导在企业改制工作中要对那些困难劳模、老工人给予特别关心、关爱”。该文见报后反响甚好，我也切身感受到他这位“工业老将”爱民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姚主任离休后，我不忙时总要去他家聊会儿。一次我在他家，他把主编并出版的《名城大同》《大同史论精选》赠送给我。更让我难忘的是，在他年近九旬之时，年逾八旬的大同日报社张文炳老总编和我去看望他，他事先得知我俩要来，上午早早地穿上整洁的衣服在家等着。见面后，他和张老总长时间握手说话，我在旁边，那时他的视力只能看见个人影，知道是我后又和我握手言谈。

光阴荏苒，世事沧桑。“不思量，自难忘。”和蔼可亲的姚主任，我永远怀念您！

春之歌

袁秀兰

春天如约而至
小草从泥土中钻出来
一棵又一棵
密密匝匝的笑容一闪一闪
花朵们站在枝头
一簇簇一团团
色泽温润，柔软的甜意
开出香喷喷的圆
小树穿上绿色的新衣
摇曳出五彩缤纷的绚丽

即使有风雨，即使有寒冷
那简单婉约的气质丝毫不减
依然天真热忱，浓淡相宜
阳光金色的底蕴
衬托着小草的顽皮
花朵的粉嫩，枝条的蜿蜒
分外优雅，美得脱俗，美得古典
这些春天的形象大使
轻而易举，融化了所有的冰雪
转瞬间，洒下一地亮晶晶的温暖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